

我的劳动生涯

——上海老工人系列访谈之一

孙兴大口述 段炼整理

[整理者按]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“十五”重点项目，其中的工人生活史部分由本人承担。为收集相关史料，进行了一系列的访谈工作，本文即为系列访谈之一。

一 在戚墅堰机车车辆厂^①

我是江苏常州人，出生于1929年。小时候，家里比较穷，我身体又弱小，种田实在太苦。1941年，当我12岁的时候，父亲托我阿姨帮忙给我找份工作。阿姨所住的村庄位于戚墅堰机车车辆厂旁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在那里做工。当时正是抗战时期，机车车辆厂属于军工企业，由日本军队管理，但劳动力严重匮乏。经阿姨村里一个工头的介绍，我进厂做了工人。

进厂之后，我先从镗工做起，主要从事机车汽缸的镗削。火车机车运转时间过长，汽缸的圆形内孔就会磨损成为鸭蛋形，这样蒸汽就不足了，必须拆卸下来进行镗削纠偏。^②我也没经过什么培训，就是跟着师傅边干边学。在这之前，我陆陆续续读过几年小学，也曾在木行当过练习生，算是有点文化，因此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。

由于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属于军工企业，工厂看守较严，凡进厂房先要抄身，怕人携带炸弹来破坏，出厂房也要抄身，怕工人偷盗物资。工厂女工也不少，有开天车的，有烧窑的，也有不少从事清洁工作的。我的一个姐姐曾在厂里做过看守，专门抄女工的身。工厂的高层领导都是日本人，车间也都由日本人负责管理，称为职场长。每天上班前，工人要在车间里集中排队，听日本管理人员训话。他们一般都用日文讲，再由专人翻译，偶尔也会讲几句洋泾浜中国话。每个车间里还有三四个日籍技术工人，他们不干活，只负责教中国人技术，相当于技术指导。日籍技术工人中，和善者也有，凶悍者更多，稍不满意，上来就打。中国工人每天吃几下耳光或被摔几个背包，也是常事。

有一次，我眼睛发炎，红肿得厉害，晚上车间里的电灯照得我睁不开眼。加上天气又比较冷，我就悄悄躲在火炉旁，闭了一会眼睛。没想到，恰逢厂部的日籍管理人员来查岗。看见我在“打瞌睡”，上来就是两记耳光，一个大背包，又顺手抄起旁边的木棍朝我打来。还好我年纪小，反应快，一下子钻进旁边的机车里，算是躲了这场毒打。

当时招工进去的农家子弟，大多由工厂包吃包住，提供制服，学习日语，教授技术，并在各个车间实习，称为养成工。^③我不属于养成工，一个月的工资折合一石米多一些，发的是中储券，^④还有一些配给面粉。我的家离工厂只有3里路，所以天天回家。工厂的北面是

^① 俗称龙头厂，位于江苏常州，其前身是清政府于1905年兴建的上海吴淞机厂，主要从事火车机车的装配和修理。1932年“一二八”事变后，国民政府决定将吴淞机厂搬迁。1936年10月，吴淞机厂迁往常州戚墅堰，正式改建为戚墅堰机车车辆厂。

^② 镗工是机械切削加工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工种，是在镗床或其他机床上用镗刀对零件内孔进行加工，以提高内孔的精确度和表面光洁度。

^③ “养成工”一词源自日文，是20世纪上半期盛行于上海棉纺织业的一种用工制度。养成工年龄较小，工期3年，最初的3至6个月为训练期，只提供食宿，没有工资，期满发给同工种工人60%至70%的工资。

^④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。

京沪铁路，^①南边是运河，上班需要摆渡。由于人多，摆渡船往往十分拥挤，甚至还沉过船，出过人命，后来就造了座桥。从我家到工厂，要经过一处义冢地。^②日本人抓住新四军后，就在这里活埋，往往是挖个坑，将人埋进去光露个脑袋，死者面孔发紫，样子很可怕。那里是我上班的必经之地，我是早、中、晚三班倒，白天还不要紧，可中班下班或夜班上班的九、十点钟光景就十分恐怖了，有的时候我一个人，更是害怕。当时又不象现在，没有路灯，也没有手电，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。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，每次晚上回家，我就用厂里的废纱头蘸上油，做个火把，一直点到家。

戚墅堰机车车辆厂的职工，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向厂方提出申请，开一张证明，上面写明日期和目的地，这样就能免费坐火车了。抗战时期，上海粮食紧张，有许多跑单帮^③的人。我们厂就有不少工人，利用可以免费乘火车的机会，偷运大米去上海贩卖。他们将米缝进马甲的夹层，穿在身上，外面套上机车车辆厂的工作服以作掩护。火车站虽有日本兵把守，也有伪军负责抄身，但只要塞点钞票，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行了。

在某一段时期，日军在前线吃了败仗，部队退下来休整，就被派到我们厂里干活，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。他们是坐着铁皮火车来的，集中住宿，早晨先要上操，然后去车间干活，我们则在一旁指导。这些日本兵从军前多为农民，根本不会操作机器，有的士兵被机器压断手指，用纱头一包，不敢声张。生怕被军官知道，当作消极怠工，要挨打受罚。日本兵崇尚武士道精神，挨打之际总是立得笔挺。他们每天只吃两顿，就吃几个很小的饭团^④，常常肚子饿。因此，他们就用部队发的旭光牌香烟^⑤换我们的馒头吃。有的士兵还用袜子、手套甚至手表，偷偷地与中国工人交换食品，可见日军的后勤补给已严重不足。他们工作的时间一般不长，也就个把月，军令一下，他们又坐上火车奔赴前线打仗去了。

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其前身是上海吴淞机厂，厂里都是些上海的老工人。抗战爆发后，工厂内迁，老工人也随之去了重庆。^⑥留下了的一些设备都由日本人接管，劳动力不足，就在当地招工。抗战胜利前夕，日本人纷纷撤离，把机器设备运往东北。有些高层管理者剖腹自杀了，车间里的日本人也没以前那么凶了，过去曾受过欺侮的中国工人就朝日本人扔石头。日本投降之后，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就由国民党军方接收了。抗战前去了重庆的老工人陆续回到厂里，工人一下子多出来了，于是我辞工回了家。

二 从常州到上海

回家后我种了几个月的地，祖母又托人帮我在上海大中华铁工厂^⑦找了一份工作。我从来没去过上海，而父亲过去在李默庵^⑧家做茶房，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。出于爱子之心，父亲不顾年迈体弱，决定亲自送我去上海。

^① 即今天的沪宁线，从上海到南京。

^② 专供贫穷无钱者安葬的坟地。

^③ 旧时上海人将独自往来于各地贩卖货物牟取利润的行为称为“跑单帮”。

^④ 其实就是日本的传统食品寿司。

^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颐中烟草公司被日本军方接管，专为日军生产军用的胜斗牌和旭光牌香烟。

^⑥ 此处有误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刚搬迁不久的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就地解散，部分员工前往株洲临时机厂。

^⑦ 创建于1940年，主要从事纺机零配件生产和纺机修配。1956年公私合营，与永大铁工厂、安泰机器厂合并。1959年1月25日，更名为上海第七纺织机械厂。

^⑧ 李默庵（1904-2001），字霖生，湖南长沙人，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。参加北伐和东征，历任连长、营长、副团长、团长。1928年以后，任第十一师三十一旅少将旅长、第十师中将师长。抗战爆发后，先后被任命为第十四军军长、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等职，率部开展抗日斗争。1946年后，又任第三方面军总司令，兼任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。1949年夏，移居香港，呼吁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，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奋斗。后长期居住于阿根廷和美国。1991年回国定居，任全国政协第七、八届常委，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。

记得当时我全部的行李包括一条草席、一条薄被褥、一件棉马甲、一件棉袄、几件衬衫和两双鞋子。我们是从常州坐火车去的上海，火车停在天目路北站，而大中华铁工厂位于大自鸣钟^①附近的新化路上。为节省费用，我们没有乘车，步行前往，经过泥城桥^②，走的是新闸路。父亲背着被褥草席走在前头，我提着包裹跟在后面。在路上，父亲买了一对大红蜡烛。到了大自鸣钟附近，父亲叫了两部黄包车。我很奇怪，为什么刚才不叫车，而快到目的地了父亲却怎么舍得花这份“冤枉钱”。事后，父亲向我解释：“上海人讲场面，爱攒派头。若是不叫车的话，会被人看扁，认为我们是乡下人。在火车站叫车，车钱又太贵，所以在工厂附近叫两辆车，既节省了钱又显得体面。”

车子到了工厂门口，介绍人早已等在那里了。介绍人是厂里的拿摩温，我来上海之前他就与老板打过招呼，老板也点头同意了。介绍人将我们带进经理室，与老板见了面，随后开始举行正式的拜师仪式。其实，所谓的师傅就是老板。父亲取出刚才买的那两支大红蜡烛，点上插好。老板端坐在椅子上，地上早已铺好了红毡毯，我庄重地向他行跪拜叩头礼。我正要跪下去行大礼，老板连忙将我一把拉起，笑呵呵地说：“算了！算了！意思意思就可以了！”就这样，我算正式入了师门，在中华铁工厂当了一名学徒工。当天，我就住在了厂里，父亲则到曹家渡^③一个熟人的家里住了一晚，第二天回了常州。在这之后，父亲再也没有来厂里看过我。

由于贫困，乡村子外出做工的人很多。那时我家的老房子要翻造整修，借了30石米，可是利生利、利滚利，三年下来总共要还一百多石米。为了偿还债务，我们兄弟姐妹陆续来到上海做工。我兄弟姐妹共5人，我排行老二。我姐姐来上海比我早，经人介绍，在上海的纺织厂里做工。我弟弟比我晚来上海，在精成机器厂^④当学徒工。我的大妹妹在13岁那一年也来到上海的纺织厂里做工，做了没几个月就染上了肺病。解放前，抗生素青霉素叫盘尼西林（penicillin），价格堪比黄金，由于厂里帮我妹妹垫付了医疗费用，因此还不肯放人。我闻讯后立即赶过去，帮妹妹付清了医药费，还买了大瓶的鱼肝油给她补身子。得了肺病，工是做不动了，我干脆让妹妹回老家去读书。回到家后，大妹妹与小妹妹一起进了学校，直到她们初中毕业，学费都是由我和我姐姐负担的。毕业后，大妹妹在常州某纺织厂的食堂里工作，后来又调到房管所。小妹妹则考到南京铁路运输学校读中专，毕业后做了列车长，后来又调到南京铁路小学做老师。因此，我与两个妹妹的感情很好，她们对我也很尊重。1962年动员回乡，我的姐姐回到了常州。我弟弟一直在上海工作，他没读过书，只能干力气活，年纪又小，吃了不少苦。临解放前，国民党在上海抽壮丁，父亲和祖母写信叫我们回去。可是我的工作条件比较好，而且早已习惯了工人的生活，再也不愿意回家种地了。

三 学徒生涯

解放前上海有许多小厂，只有一两部机器、两三个工人，甚至连老板都要做工。在这些小厂里学生意，头两年要帮老板做家务、带孩子，直到第三年的下半年才让你上机器学点技术。我所在的大中华铁工厂，规模比较大，有近百名工人，比较正规。在上海学生意，没吃

^① 区片地名，位于今普陀区长寿路西康路口周围一带。1924年，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为宣扬已逝董事长川村利兵卫的功绩，在今长寿路西康路口建造了一座川村纪念碑，顶端嵌有四向大时钟，人们遂以此钟塔称其所在地带为“大自鸣钟”。

^② 区片地名，位于今黄浦区境内，大致范围在西藏中路与北京东路、北京西路、新闸路、芝罘路相交地带。名称缘自于泥城浜（1912年填没，改建为西藏路）上的桥名。

^③ 区片地名，位于今普陀、长宁、静安三区交界处，长寿路、万航渡路、万航渡后路、长宁路、长宁支路五路交会处周围一带。

^④ 1935年，由范贻年、任全杰等人创建。1960年底，与伟大、史永泰、徐顺光、宝顺等机器厂及和兴铸工厂合并，成立公私合营中钢机器二厂。后又与人民铁工厂合并为上海人民机器厂。

什么苦。大中华铁工厂，这个厂规模还可以，比较正规。我的同辈师兄弟很多，根据进厂的先后，我排在第7个。

进厂不到一个星期，老板给了我一部机床，并安排一名老师傅教我技术。所谓的学生意，其实就是自己多看，自己琢磨，不懂的再去问师傅。每个师傅同时要管好几部机床，自己不用操作，专门带像我这样的学徒。一开始我做的是小机床，不久换成了大机床，后来我一个人同时做两部机床。平时机床的保养及一般性修理都是我们学徒工自己负责。当时，从事机床技术工作是比较吃香的，被称为“外国铜匠”。^①机器上的文字标识都是英文，尺寸都用英制。时间长了，我们也习惯了用英语译音来称呼机器零件，比如引擎、马达、凡尔盘、维丝等等^②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我们每天工作8小时，周日休息。吃住都在厂里，午饭和晚饭是三荤两素一个汤，都是大块的肉或整条的大黄鱼。早餐吃粥，就着咸菜，还有油炸花生、油炸豆瓣、乳腐、肉松什么的，伙食还不错。一般休息天我们也在厂里食堂吃，若是睡懒觉睡过了头，食堂总还有些剩余的饭菜。晚上下班后，老师傅都是回家吃饭的。我们还要加两个小时的班，擦擦机床、扫扫地、搞搞清洁工作，称为小夜工。

我们睡的是两层的铁床，没有正规的宿舍，凡是车间空余的地方都可以放一张床。夏天比较闷热潮湿，臭虫成灾。掀起草席，常常能看到成群的臭虫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一天劳累下来，本想睡个好觉，可臭虫的叮咬让人根本无法入眠。为对付讨厌的臭虫，我们想出了许多土办法。由于臭虫怕水，我们就将床抬起，在四条床腿下分别放置一只盛满水的大碗，以阻止臭虫沿着床腿爬上床。为增强驱虫效果，还在碗里倒入高粱酒，甚至加些毒性药物，这样一来床上的臭虫果然少了许多。不过床和草席的缝隙内原本就栖息着不少臭虫卵，没多久就又会出许多小臭虫。我们没钱购买灭虫药，于是就从车间里拿些山奈^③撒在草席下来杀臭虫。山奈是有剧毒的，臭虫虽然是消灭了，但睡在这样的床上就好像睡在棺材上。

老板不大愿意用老师傅，一是所支付的工钱大，二是资格老不太听话，反而更愿意收我这样的学徒工。我这一辈有六七十个师兄弟，分为许多不同的工种。至于学徒工待遇，每月月规钱是固定的，开山大师兄的收入比较高，然后按档次略有区别。满师后，成为正式工人，拿正式的工资，收入会高许多，待遇相对较好，来去也有了自由。学生意时的月规钱，只够零用，一般用来剃个头、洗个澡，或者买些肥皂等日用品。逢年过节还有节规钱发放，主要是端午节、中秋节、春节这3个传统节日。节规钱就相当于现在的红包，每个工人都有，根据业绩发放，谁做得好钱就多一些。当然，为了避免矛盾，节规钱的数目彼此之间是严格保密的。由于我工作比较努力，节规钱往往拿得比较多。我就这些钱为自己添置些衣服，买些日用品。有一次，我买了一件飞行衫，^④买了双皮鞋，还给乡下的祖母买了些吃的东西。端午节、中秋节工厂放假一天，春节的假期长一些，有时我会回老家，但为了节省路费我一般都在上海过年。如果老家有亲人生病，可以向厂里请假，回家探望。

老板并不是每天来工厂，生产上的事都交给那摩温^⑤打理。一个星期只来两三次，了解一下厂里的财务状况，然后去车间转一圈，与工人们寒暄几句。那时候老板对我们十分客气，

^① 解放前，上海人称从事金属修补的传统手工业者为“中国铜匠”，称操作机器加工零件的工人为“外国铜匠”。

^② 引擎(engine)，发动机；马达(motor)，电动机；凡尔盘(valve)，阀门；维丝(waste)，擦机器的废纱头。

^③ 山奈，学名氰化钠(NaCN)，灰白色粉末状结晶物，一般在工厂里用为淬火剂。山奈为剧毒品，口服、吸入或经皮肤吸收均会引起急性中毒，口服50毫克即可致人死命。长期接触山奈，会出现头疼、恶心、呼吸困难、四肢无力等症状，严重危害健康。

^④ 夹克衫的一种式样，因电影中的美国飞行员经常穿着而得名，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上海青年中流行一时。

^⑤ 即工头、领班。“那摩温”在上海方言中原指蝌蚪，而英语number-one与之发音相近，因工头在点名时总排在第一号，所以被工人们贬称为“那摩温”。

反倒是大师兄对我们比较严厉，生产上出了差错往往会被他教训。俗话说：“先进庙门是为大。”开山大师兄里很有权威，如果他对伙食不满意，食堂里的饭师傅还要出来赔不是。

每逢过年，我们这些学徒工还要到老板家去拜年。老板住在普陀路、江宁路附近两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里。进屋之后，老板家的保姆给我们泡茶，上面总会放着两枚橄榄^①。我们向老板拜年，老板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压岁钱，新年新事新气象，大家都高高兴兴的。

学徒期间，我没怎么吃苦，有吃有住，比起家乡的农耕生活，我已经感到十分满意了。就这样，我一直住在厂里，度过了三年的学徒生涯。

四 精成机器厂的岁月

满师之后，上海已临近解放，工厂大多停产，工人一律疏散。当时国民党准备负隅顽抗，大自鸣钟地区的马路两旁布满了木栅栏、铁丝网。大中华铁工厂无法开工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笔疏散费。我弟弟所在的精成机器厂也停工了，恰巧父亲又写信叫我们回去。虽然我不想回家，但在上海实在无事可做，我们俩只好一起回了老家。

由于陆路已经中断，我们只能前往苏州河天妃宫桥^②乘难民船回家。我们乘的是一艘绍兴船，^③船并不是马上就开，足足等了一整天。起航后，船向东驶进黄浦江，往上游西南方向行驶。船一直开到沪杭铁路桥边，桥已被国民党飞机炸毁了，这里的船只很多，需要排队穿过桥墩。这时解放军已经到了上海郊区，我们看见解放军在铁路边行军，队伍中间还夹杂着运送物质的马匹。不一会儿，国民党飞机来了，一阵机枪扫射，我心里怕得要命。船继续前行，迎面开来了一艘解放军的小火轮，上面插着红旗，前面架着轻机枪。他们向我们喊话，得知我们是难民船，也就放行了。以前我还不晓得共产党、解放军是怎么回事，有了这次经历，知道解放军并不是凶神恶煞，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掉了下来。船驶进太湖，扯起了帆，开得很快。到无锡后，我们上了岸，转乘火车到戚墅堰下车，安全地回到了家乡。

此时常州已经解放，解放军接管了戚墅堰机车车辆厂，招收技术工人。我本身就是车工出身，又不想在家种田，于是去报了名。通过招工考试，我成了一名临时工。可6个月临时工期满后，我再一次失业回了家。

又过了几个月，我弟弟所在的精成机器厂复工了，他先回到了上海。精成机器厂位于普陀区新会路，主要生产印刷机器。解放前，印刷报纸所使用的轮转机，只有精成厂能够生产，全国独此一家。^④解放后，为配合政治宣传的需要，报纸印量聚增，工厂生意十分红火。为了扩大生产，精成机器厂引进了6部机床，却又缺少技术工人。于是弟弟介绍我去了这家工厂。进厂后，先试三天工，如果不行，结帐走人。试工合格，则签定劳动协议书，生老病死工厂概不负责。协议书除双方签字外，还必须找一家单位做担保。我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的，只能去找以前工作过的大中华铁工厂。我找到经理，说明了情况，他还算通情达理，二话没说就给我加盖了公章。

就这么做了三年，我一直属于试用工，因此想离开这里去别处发展，恰巧上海机床厂^⑤正在招人。当时我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，做工不能固定在一个厂一个工种，否则自己所掌握的

^① 即元宝茶，旧时沪上过农历新年时用的一种茶点。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，亲友登门拜年，主人向客人敬茶，须在茶盘的托边上放两枚橄榄，寓意新的一年和顺吉祥、财源广进。

^② 即河南路桥，因桥北堍建有祭祀妈祖的天妃宫而得名。

^③ 是一种起源于绍兴，适用于杭州湾异常航行条件的平底帆船。船体采用箱型结构，拥有鼓形的舷板和弧形的轮廓。船的长度从18米到30米不等，渔船较小，为双桅；运输船较大，为三桅，可载货百吨以上。船首绘有老虎或凤凰的形象，船身涂满了鲜艳的色块和装饰图案，使人看过一眼便终身难忘。

^④ 1947年5月，精成机器厂仿制成功中国第一台RP-32型对开报刊凸版轮转印刷机。

^⑤ 位于军工路虬江桥南，是国内最大的精密磨床、精密量仪专业制造厂。其前身为1946年8月组建的农业机械公司虬江机器厂。

技术过于单一，不利于自身的发展。各个工厂每种产品都不一样，乘着年轻，多换几家工厂，多做几个工种，可以多学点技术。精成厂的老板知道我要走，即刻找我谈话，说什么“做生不如做熟”，还将我转成了正式工。

就在我嚷嚷着要走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人也准备离开，他就是厂里的德国工程师。这个德国人中文名字叫毛富刚，60岁左右，毛笔书法很好，中国话也说得十分流利。他原来是一家洋行里的大班，洋行倒闭后经人介绍进了精成机器厂当工程师。他主要在家里搞设计，一个星期只来厂里三四次。精成厂是普陀区的试点单位，1953年即开始搞公私合营。公私合营后，毛富刚就不想再做了，一会儿说姐姐年纪大了要回欧洲照顾，一会儿又说要回去结婚。其实，毛富刚家中有女伴，她在德国的一个办事机构工作，不过两人只是同居关系，并没有正式结婚。当时精成机器厂属于普陀区地方企业，区里的领导极力挽留毛富刚。老板也不让他走，还在宛平路专门给他买了一栋小洋楼。由于路程较远，毛富刚每次来厂里都是骑自行车，从来不坐汽车或黄包车，这也许是外国人喜欢体育锻炼的天性。他对厂里的工人很客气，看见我们总是笑嘻嘻地打着招呼：“你好！你好！”然后发上一圈香烟，记得他抽的是大前门，^①在当时也算是不错的香烟了。

外国人做事仔细，检验十分严格。有一次，毛富刚设计的一部压纸板机皮带盘不平，容易松动，装配机器的师傅问我有什么办法解决？我说可以适当做些小的调整，不过德国工程师设计的东西我不敢动。那位师傅说，毛富刚检查没那么仔细，应该不要紧的。经不住他的恳求，我将机器的皮带盘稍微改动了一下。后来毛富刚来工厂检修设备，他身穿一件当作工作服的旧风雨衣，戴着近视、老光两付眼镜，手持一把游标卡尺，东看看西瞧瞧。到了那部压纸板机，发现被人改动过了，顿时勃然大怒，暴跳如雷，指着我劈头夹脸地一顿臭骂。陪同他检查的厂工会主席吓坏了，站在一旁也不敢劝。那个恳求我改动机器的师傅，早就不知道躲哪儿去了。我被他足足骂了10分钟，骂的都是德国话，反正我也听不懂，只好闷声不响地低着头。后来，他还去厂部向老板告了我一状。我向老板解释，并没有改动机器，只是调整加固了皮带盘。等毛富刚冷静下来想了一下，觉得我的改动确实是合理的，连忙向我道歉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你改得很好！”不过他还是认为，凡涉及机器设备的事，我应该先和他打声招呼。从此之后，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。有一次，毛富刚还邀请我去他家玩，我没有去。事后他埋怨我，说是那一天准备了许多西点，可我却失约了。

后来毛富刚还是走了，先去了香港，与他的同居女伴结了婚。回到联邦德国后，他在一所大学执教，教授学生中文。“文革”期间，联邦德国有一个代表团来上海访问。他闻讯后，托人专程来厂里看看我们这些老同事，还带来了一封亲笔信。可是迫于当时的形势，大家都怕背上“里通外国”、“文化特务”的罪名，谁也不敢与他通讯联系。

精成机器厂陆续合并了一些小厂后，更名为公私合营中钢机器二厂，后又与上海人民铁工厂^②合并成为上海人民机器厂。从精成机器厂，到中钢机器二厂，再到上海人民机器厂，我一直做到退休，期间还入了党。经人介绍，我结了婚，有了小孩，总算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家。

[口述者简介] 孙兴大，江苏常州人，生于1929年。上海人民机器厂退休工人。

[整理者简介] 段炼，助理研究员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

^① 大前门牌香烟原为英美烟公司产品，1916年开始在青岛、天津、上海三地生产，产品遍及全国各地。

^② 1954年，上海人民印刷厂与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熔炼工场合并，成立国营六一四厂，其铁工分厂改名为上海人民铁工厂。